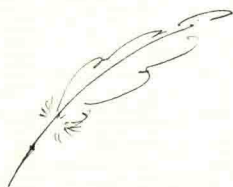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刘小枫 ● 主编



[美]拉尔夫·C.汉考克 Ralph C.Hancock ● 著

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

Calvi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何涛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刘小枫 ● 主编



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

Calvi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美]拉尔夫·C.汉考克 Ralph C.Hancock | 著

何涛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美)拉尔夫·C. 汉考克 (Ralph C. Hancock) 著; 何涛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3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Calvi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ISBN 978-7-5080-9125-9

I. ①加… II. ①拉… ②何… III. ①加尔文 (Calvin, John 1509—1564)—政治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979.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1843 号

Copyright © 1989 by Cornell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4660 号

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

作者 [美]拉尔夫·C. 汉考克

译者 何涛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古典教育基金·“益道”资助项目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出版说明

基督教并非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原始宗教,而是从古希腊宗教、古罗马宗教、犹太教等民族政制宗教的母体中孕生出来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成为政制性宗教以后,孕生基督教的古希腊罗马宗教成了所谓“异教”,基督教与“异教”的交融及其内在冲突便构成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是基督教的西方,现代性是基督教文化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现代西方文化发端于“异教”文化的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从马基雅维利、培根、霍布斯到尼采,基于“异教”思想立场对基督教的攻击逐渐从隐秘走向公开。尼采把现代启蒙哲人诊断为病人膏肓的病人,因为他们在“充斥着机密和压抑的空气”中不断编织“无比丑恶的阴谋之网”(《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14节)——但尼采同时指出,现代启蒙哲人的普世博爱看似源于基督教宣扬的爱心,其实来自普罗米修斯点燃的火堆:

我们的科学信仰的基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就连我们现在的这些认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就连我们的火也是取之于那由千年的古老信仰点燃的火堆。(《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第24节,周虹译文)

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因此是西方思想史上

的枢纽性问题。本“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些论著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编译者期望这套“丛编”有助于我国学界的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进入西方大传统的纵深，搞清基督教与古典传统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5 年 5 月

序 言

我最初关注加尔文主义与现代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始于反思美国政治唯心主义的清教背景、反思托克维尔所谓“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在美国的“奇异结合”。我发现这种结合既奇异也令人迷惑,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种明确理性的、世俗的自然权利理论,这种自然权利理论由霍布斯创立,并被洛克所改造,它直接反对宗教的政治要求。那么,一种宗教的世界观又如何可以成为人们追求明确世俗目标的动机呢?

也许就像今天大多数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宗教与理性主义的这种美国式的融合,这种加尔文与洛克的融合,不过就是一种混淆。对此我没有这么肯定。某种对于理性的独特理解和某种对于启示的独特阐释共同激发起同一项事业,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如果自然理性的活动本身被认为是最佳生活方式的本质——就像在古典的苏格拉底式传统中那样,那么我们的答案也许就是否定的。但是,现代理性主义不等同于向作为目的本身的理性开放。相反,它对一切非理性的权威,带有一种明确和有计划的敌意,并且把一种反思考性(antisepeculative)的方法用作无限扩展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理性主义所代表的,不是理智有表达或沉思理念的独特之善的自由,而是要有条理地运用人的心智,以反对加诸人类整体力量之上的一切限制。既然界定人类行为的目的和描述它的好处

就会给人类造成某种限制,使他们屈服于自己力量之外的某种东西,所以理性主义者就更完整和更精确地描述了位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理念之间的那些障碍(偏见、传统、习俗),而不是这些理念自身的本质(比如:自由、进步、解放)。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世俗主义主要也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进程。因此,理性主义的规划不仅截然不同于古典理性,而且直接反对它,即人在本性上追求最佳的生活方式。

我所说的古典理性与代理性主义的对立并不是原创性的,而且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证明或扩展这种见解。其实,我是想凭借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这种对立,来质疑理性主义与启示之间的对立。我试图证明的是,在理性主义与基督教明显而直接的对立之下,存在一种潜在的深刻交汇,而这种潜在性最清楚地表现在加尔文对基督教的缜密解读之中,而非加尔文—洛克主义者可能的混乱修辞之中。

为了要支持这种看法,我必须要证明,加尔文不仅攻击了古典的、目的论的理性概念,而且从根本上愿意接受那种涉及方法和手段之理性的权威性。但是,为了要揭示代理性主义的精神与加尔文主义的精神汇合在一起的最深刻基础,就只有超越理性的工具性,来思考这两者如何都能够要求人们绝对地致力于一种其目的不能被把握的实践,还要思考这两者如何都能够将人类纯洁的需求从理性错误要求的自我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最终的拯救。

为了不让理性主义对它的直接对手即基督教政治权力的攻击照它自己定义的特征而成立,于是,我试图阐释清楚这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一种奇妙的亲缘性。我认为理性主义的主张与启示的主张之间的对立,在理论以及实践上的深刻性和重要性都比不上它们二

者作为同一方,而古典主义所理解的“理性”作为另一方的对立。

我想要在这些基本问题的框架内(这些问题只能随着我论证的发展,逐渐被阐释清楚),重新提起(或以一种新方式来提起)那个关于基督教特别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贡献问题:即对于一种有关人类的,以及他们与非人类世界之间关系的独特现代观念的出现所做出的贡献。我这里说“重新提起”是因为,关于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场现代运动这样的看法远不是原创性的。就像我将在导论里提到的那样,这种看法一直以来获得了多种不同形式的拥护,比如黑格尔、辉格派史学家以及好几代的自由派新教徒。对于很多当代学者们来说,更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韦伯,他正确地指出,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倾向于使它的信徒从事资本主义事业。然而,大体说来,自从现代自由主义开始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之后,那种认为新教教义本身对现代世界做出了一种根本性贡献的看法已经处于守势。

在很多学者看来,那些关于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各种残存的现代派解释,更多只是人们轻信的一种说辞,而不是一个本身能够成立的论点。因为他们指出,相比于加尔文明显表现出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一种极端的宗教或来世的热情,同样清楚的是,现代理性主义只专注于此世的善和“世俗的”(secular)领域。而本书导论部分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质疑将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区别于宗教的、来世的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从而准备对加尔文主义进行一种全新的反思。在这一章,我将通过深入考察有关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这个历史问题,着手描述加尔文所提出的哲学性问题。接下来,我会简单地涉及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学者的看法,他们拒绝认为加尔文主义具有任何现代性,而他们所依赖的看似非常合理的前提完全就是世俗范畴与宗教范畴之间的简单对立。这项讨论可以

让我证明,如果我们想要把握加尔文的话,就必须准备好重新考虑“世俗主义”(secularism)或“此世性”(worldliness)这些我们很轻易就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的含义,并因此质疑现代在理性主义和宗教之间的二分法。与这种二分法相关的关于“此世”(this word)的观念,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永恒真理,而是现代思维之独特背景的一部分。

这组范畴不受质疑的权威性,原本会妨碍我们理解加尔文主义的根本含义,而在对它的批判之后,就可以在本书的正文部分转向讨论原初的加尔文主义。这项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这位宗教改革家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而它主要采取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贴紧文本的评注方法。我确信,为了要支撑一种关于加尔文思想的非常惊人的看法,并且充分揭示出加尔文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以及盲点,只有采取这个有时并不与我的中心主题直接相关的方法。

我对加尔文整个思想体系的考察,开始于他最直接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教义,并探查出它们的神学基础(第一部分),随后是考察这些神学基础本身,从而找出一个中心的、生发性的理念或意向(第二部分)。我将证明,加尔文摧毁了在世俗关怀与宗教关怀之间的那种简单的二分法;无可否认,他确实彻底区别了这两者,但他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将它们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上帝被抬升到了远远高过人类之上的地方,以至于神圣的东西再也不能作为一个标准,来排列各种人类关怀的高低等级,而只能是对人类那些明显和普遍利益的一种认可。

考虑到这种关于加尔文思想的看法很可能是惊人的,甚至是让人不快的,让我一开始就再次强调一下,这里所关注的加尔文思想,

是在他最系统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我认为最深刻和最原创的要点。我没有宣称自己解释了加尔文的全部教义,我仅仅是发现了一种具有深远哲学意义的潜在结构。很明显,加尔文并没有总是从他自己的激进前提中推导出最终的结论;很明显,在很多问题上,他还是停留在一种传统基督教虔信的视域之中。尽管这种虔信并不是本书的主题,但聪明的读者们将会看到,我的论证绝对没有不尊重加尔文遗产中这种较少独特性但绝对高尚的部分。

就像我将在第五章中指出,并在结论部分更加充分解释说明的那样,让人最惊讶的地方是,加尔文对于基督教的解释从根本上反映了现代“理性主义”的深层结构。这种观点表明,我们也许忽略了自己特有的现代假设的完整底色和含义。世俗性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范畴或有关实践活动的一种自我维持的领域;我们对于“此世”,对于这个声称“理性的”世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专注,其实是一个有意为之的更大背景中的一部分。换言之,不借助于一个此世之外(如果不是“之上”的话)的立足点,我们对于世俗事务和理性事务的专注就不能得到理解。不论这种立足点是否诉诸宗教权威,构建了此世的那种目的本身却并不能被列入此世的范围;因此,现代世界不可能是完全“此世的”或“世俗的”或“理性主义的”。

我对加尔文的解读表明,韦伯在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一种亲缘性时,要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更正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也许可以说,我的目的就是复兴关于加尔文主义的现代派解释。但是关于这种亲缘性的一种全面性反思,必定是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的,它既挑战我们对现代性的看法,也挑战了我们对加尔文主义的看法。因此,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根据一种关于现代性

的现成定义来重新定位加尔文主义,或者是提名加尔文进入某种已经建成了的现代奠基者的万神殿之中。相反(这也是我背离了施特劳斯的地方),我恰恰是想要质疑现代性是否能够根据它自己的主张容许一个从根本上一致的定义,以及它是否存在着奠基者或一个基础。我希望将加尔文主义属灵的世俗主义,作为现代唯心的唯物主义的镜子;目的是为了反思,那个与加尔文主义一样明显依赖于一种理性之外的力量的现代理性主义,能否对其自身给出一个全面的和完全理性的解释。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托克维尔的这个判断就是正确的:为了给现代世界的文明提出辩护,所需要的不只是现代文明的辩护。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本书是基于我在1979年就开始的一项研究。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我不甚强健的记忆力以及我经常忍不住把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和未完成的手稿硬塞给乐于接受的朋友和同事们,所以这里很难公平地感谢所有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曾经给予宝贵的建议和鼓励的人们。我的几乎所有的学界的朋友们都曾帮助过我,因此,借此机会向他们全体所表示的感谢只能算是一项最低的敬意。而我下面冒昧提到这些名字,是少数一些长期以来都尤其慷慨地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和见解的人们。

十几年来,与米诺维奇(Peter Minowitz)和斯托尔(James Stoner)富有启发性的交流让我受益颇多。这从我们还是研究生同学时就开始了,直到我们后来在相隔很远的机构中担任教职时才很遗憾地不再那么频繁。在我最早供职的地方,我的这本著作以及许多其他研究都很幸运地获益于佩恩(Thomas F. Payne)、莫里斯(Rodler Morris)以及布朗(Kendall Brown)的智慧和判断。艾登和(Robert E. Eden)拉布金(Jeremy Rabkin)也对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鼓

励。我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匿名评审们所提供的大量重要批评和建议,尤其是我的编辑阿克曼(John Ackerman),他非常专业和友善地处理了一个我们原本都希望更短暂些的过程。

多年来,从各位师长那里所获得的恩惠更是难以估量;如果没有他们,我不仅不可能完成,甚至不可能去设想目前的这项研究。除此之外,他们使我能够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否则,我的人生将会变得无限贫瘠。我必须特别提到杨百翰大学的三位老师:索伦森(Don Sorensen)、米德格里(Louis Midgley),以及雷诺兹(Noel Reynolds),今天我们已经成了同事,但我还是要继续向他们学习。本书较早一个版本的审稿人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不但提供了知识上的帮助,并且为人非常友善。最后,我要承认自己极度幸运地在研究生第一年遇到了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他关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次公开讲座中,我第一次意识到,过去的伟大文本能够揭示最深刻的当代问题。他还让我注意到了现代唯物主义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以及现代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如果没有这个深刻见解的话,我的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当我在关于加尔文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东西,但还远远未能证明之前,曼斯菲尔德先生支持了我的信心,并且提供了及时和必不可少的批评与鼓励。我会永远对他的建议和他所做出的示范致以最高的敬意。

我要感谢华廷·圣伊莱斯夫人基金会,密歇根安娜堡的厄尔伯特基金会,以及希金森和汉考克家族在我写作之前的版本时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我要特别感谢尼尔森(Susan Nelson)、麦考斯基(Mc-Caskey)以及里德(Reid),在各个阶段协助我打印手稿。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非常友好地允许我查阅他们正准备出版的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的《现代的正当性》(*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的翻译手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教导我同时注重品行与思考;我的妻子朱莉(Julie),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提供支持;我们的儿子,约翰(John)、纳撒尼尔(Nathaniel)和贾尔德(Jared),他们的出生和成长几乎与我的著作保持一致,但是他们远比我的著作出色;还有玛丽(Anne Marie),她正是在我写作最后几页时来到了这个世界,这恰好及时地提醒了我们,被给予的东西如何无限地超过了我们能够做成的任何东西。

汉考克

犹他州,普罗沃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宗教改革与现代政治的起源	1
第一部分 加尔文的实践教诲	35
第一章 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与联合	37
第二章 天佑、基督徒的自由与教会政府	52
第三章 政府与人民	85
第四章 法律与伦理	113
第五章 理性、理性主义与历史	136
第二部分 加尔文的反神学	161
第六章 称义与成圣	163
第七章 灵魂与上帝的形象	185
第八章 加尔文之反神学的中心	204
结论 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现代的正当性	212

导论 宗教改革与现代政治的起源

[1]按照贡斯当 (Benjamin Constant) 的观点,

基督教正是在新教教会的怀抱中,立刻恢复了它古代的纯洁性并开始向前进步,它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种与任一时代都保持同步的教义,因为它跟得上每个时代的步伐;对每一种光照都保持开放,因为它从任何角落来接受这些光照;用每一种新发现来丰富自己,因为它不抵制其中的任何一个;使自己与每个时代都保持在同一层次上,所有与人类理智每天都在创造的进步相比落后了的观念它都弃之不顾。^①

在有关新教本质的问题上,加尔文的权威可能更高——他肯定会激烈反对上述观点。即使是一个对加尔文的生平与学说仅仅略知一二之人,也会有充分的理由对下面这种看法不屑一顾:即这个宗教改革的奠基者本人也许会认可进步主义的宽容理念,后者正体现在贡斯当所谓“纯洁”基督教的特质之中。只需要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就行了:一个曾经极力要求处死西班牙异端塞尔维特 (Michael Servetus)——他被指控犯有否认三位一体的亵渎罪——的

^① Benjamin Constant,《宗教观念的进步发展》(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Ideas),转引自 Arieli,页216。

人,看起来不可能符合贡斯当所说的“向每一种光照”保持开放的标准。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切实的并且甚至非常明显的反对理由,那种认为宗教改革,尤其是采取了加尔文主义形式的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运动并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现代之开放性奠定基础的看法,至少自从十九世纪就广受欢迎。[2]辉格党的史学家当然非常喜欢证明加尔文主义对于现代自由的进展所做出的贡献。^①然而,将新教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理论版本是由黑格尔提出的,他在《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评论道,“在日耳曼,启蒙运动是出于神学的目的而进行的,在法兰西,它一开始就站在反对教会的立场上”(《历史哲学》,页444)。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新教世界本身已经在思想领域里有了很大发展,以至于能够认识到自我意识的绝对顶峰”。“这便是宗教改革的本质”,黑格尔写道:“人类因其本性就注定要变成自由的”(《历史哲学》,页417)。

关于新教与政治及社会进步之间存在某种亲缘性的看法,在自由派新教徒那里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在研究加尔文的众多学者中,杜美尔(Emil Doumergue)无疑是这种观点的最突出和最高产的代表,他在1899年到1927年间,陆续发表了七卷本的大部头著作:《加尔文时代的人与事》(*Jean Calvin: Les hommes et les choses de son temps*)。杜美尔关于加尔文主义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看法非常清楚:他直接认为加尔文称得上“现代世界的奠基者”(《加尔文时代

^① 参见 Butterfield,《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1965), 页40-47。